

赵
德
泉

《水泥》 浅析

小说《水泥》出版于一九二五年，是苏联老作家革拉特珂夫(1883—1958)的代表作。这部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在苏联国内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高尔基对《水泥》的出版是很重视的。他在给革拉特珂夫和其他作家的书信中多次提及这部作品，并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给《水泥》作者的信里写道：“在我看来，这是一本很有意义的、很好的书。从革命以来，这本书头一次紧紧地抓住了并且辉煌地说明了现代生活中最有意义的题材——劳动。在您以前，还没有人这样有力地接触到这个题材，并且是这样巧妙地接触到”

(见叶冬心译《水泥》)。卢那察尔斯基一九二六年在《我们的艺术的成就》一文中指出：“在小说方面，无产阶级队伍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其中占首要地位的应该算是革拉特珂夫的分量大和影响深的长篇小说《水泥》”(乌汉诺夫：《革拉特珂夫的创作道路》，1953年，莫斯科版，第50页)。鲁迅在世时，特为《水泥》(又译《士敏土》)的插图作了《图序》。他说：“小说《士敏土》为革拉特珂夫所作的名篇，也是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见董秋斯译《士敏土》)。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苏联的社会同《水泥》所描写的二十年代初期的社会现实，已经完全不同了。《水泥》里描绘的苏联工人阶级已经从国家的主人沦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奴隶；在十月革命炮火中诞生的革命的苏联文学，它的光荣传统遭到了恣意的歪曲和践踏。《水泥》在今天究竟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它在哪些方面会使我们受到启发呢？本文试图从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十月革命以后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懂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摆脱被动挨打的处境，必须以改天换地的彻底革命精神，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小说所写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至十月之间。作者选取了当时的一切重大的事件，作为小说的背景：恢复备遭七年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阶级敌人的疯狂破坏活动，党关于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的决定，党的新经济政策的颁布以及一九二一年的清党工作。《水泥》正是从这样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从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进行描写的。那时，“过度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年份，是布尔

什维克党历史中最艰巨的时期之一”（《联共党史》第九章），因为“国家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反武装干涉战争弄得穷竭不堪了”，“大多数工厂停闭了，矿山和矿井有的被破坏，有的被淹没了”，但是，“党在紧张的环境中，终能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到新经济政策的困难转变”。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建设时期，苏联工人阶级“表现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热忱”。同时，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由于饥饿和疲惫的关系，有一部分工人表现出不满情绪”（均见《联共党史》第九章），但是，由于党的教育和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工人群众这种不满情绪很快就消除了，并且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地投入了经济建设。《水泥》涉及了这段历史时期的各个方面。正是这一切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构成了影响和支配小说人物的思想行为和推动故事发展的典型环境。

小说的情节是环绕着水泥厂复工这一基本线索展开的。小说开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荒凉的工厂”，“一座静悄悄的被人遗忘了的工厂”，它成了一口“棺材”，“埋葬了劳动的坟墓”，“一具死尸——垃圾堆，瓦砾场，耗子窟窿”（引文据叶冬心译《水泥》，下同）。反革命匪徒到处流窜，进行破坏，钻进党内的阶级敌人妄图从内部扼杀苏维埃政权。工人有的养羊养猪，有的偷盗工厂材料制造打火机，有的跑到乡下搞投机生意。总之，工厂瘫痪了，工人们处于绝望、无援的状况。在这严重的现实情况下，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十月革命的旗帜能不能打下去，红色政权能不能维持和巩固？《水泥》的作者通过艺术形象生动具体地、使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告诉读者，国家的困难是严重的，但这是暂时的现象，工人一时的糊涂

和消极情绪是当时环境所致，并非本质的表现。他进而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必须大力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由于有了党的领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群众中蕴藏的巨大社会主义积极性，无产阶级一定能够在经济战线上夺取伟大的胜利。这就是《水泥》的基调。作者宣扬的不是消极悲观绝望的情绪，而是引人向上的积极乐观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小说的情节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这种鲜明的创作意图：“几千几万的大众”的“突击劳动的完整的交响曲”和“总象一首音乐的英雄似的”“情景”激励着作者创作一首“群众劳动的史诗”“长篇的散文诗”（见革拉特珂夫：《我怎样写作〈水泥〉》），一曲歌颂社会主义劳动的绚丽宏伟的诗篇。从小说的布局上，我们也不难看出作者的用意，整个作品的十七章中只有前三章是写“荒凉的工厂”和“冷落的家”，从第四章召开党支部大会做出工厂复工的决议之后的全部篇幅都是描写为使工厂复工而进行的斗争和劳动，而在第八、九、十三、十五和十七章中作者以满腔的热情和动人的抒情笔法描绘了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的图画。广大工人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逐渐意识到，现在所从事的是一种“新的劳动”、“自由的劳动”，他们无比珍惜这种“用斗争一火和血争来的”劳动权力，并且把它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

共产党员格列勃从战场转到工地，象在前线一样为社会主义作战，“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叫工厂开工”。他表达了工人们的心愿，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和支持。工会主席卢哈瓦自始至终竭力支持格列勃恢复工厂的计划，把它看成是党的“基本工作任务”。这个人从不知道辛苦和疲劳，只

有“热情的火焰在他眼里永不熄灭地燃烧着”。布润扎是在工厂里长大的，“机器间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他严肃而激动地对格列勃表示“工厂一定要开工，工厂不能完蛋，……不然的话，干吗要革命？咱们斗争是为了什么？你争取这颗勋章是为了什么？”瞧，一个普通的工人用最朴实易懂的语言把革命和建设的关系，讲得多么透彻明了啊！他劝自己的老朋友格列勃说：“你要尽一切力量，点着第一枝火柴。你可以永远信赖我。”钳工洛沙克同样懂得只有“把工厂整顿好”，“情况才会好转”。还有正直善良、热爱劳动的萨夫楚克“疯狂地挥着锤子”，劳动的热情使他无比兴奋和激动。象卢哈瓦、布润扎、洛沙克、萨夫楚克这样的工人成千上万，他们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劳动大军，在他们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们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工厂开工了，它“现在象一个力士，象一个美男子！”这里“石头都活了，变成了人”。格列勃说得好：“咱们是生产水泥的。水泥代表咱们，同志们，代表工人阶级。”他们最终把工厂“从坟墓里拖出来”并用自己的“鲜血使它发光”。作者用激扬的文字，抒情的笔调，诗一般的语言赞美伟大的劳动，歌颂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瞧这一些——群众、大海、工厂、城市和天边以外遥远的地方：整个俄罗斯都是我们的……所有的一些伟大的东西……都在内心中歌唱着，歌唱伟大的劳动……予感到要投入顽强的工作了，难道我们的心脏能不狂跳吗？……这是工人的一我们工人的俄罗斯，这是许多世纪来人类梦想着的新世界……”“好极了。一切都是伟大的、不可限量的，太阳跟人一样活跃。它用血液灌满人体的每个细胞，用希望和对未来的信心照亮一切。”

《水泥》具有强烈的思想艺术魅力，它

洋溢着激动人心的对光明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引起读者的共鸣和赞美。它生动、具体而又纵情豪放地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其次，作者的上述创作意图尤其表现在格列勃这一经济战线上共产党员典型形象的塑造上。格列勃这一中心人物在小说里是写得最生动、最成功的。他是苏联文学史上出现最早、刻画得最深刻的苏联工人形象。格列勃是经过战火考验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工人阶级远大眼光的布尔什维克，一个百折不屈、“哪怕是山倾斜了”也要“扶正它”的顶天立地的英雄汉，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的实干家，同时又是一个“跟千万人心心相印、息息相关”（革拉特珂夫：《我是怎样写作〈水泥〉》）的、土生土长的普通工人。《水泥》正是通过共产党员格列勃率领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基本情节的扩展，通过以格列勃为首的工人群众与公开的武装反革命分子和隐蔽在党内的阶级敌人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的逐步开展，在苏联文学中第一次生动而具体地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捍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历史的真实面貌，给读者展现了一幅二十年代初期苏联社会的画卷。

作者赋予格列勃形象的基本特征有两点：一是他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立志为人民献身，二是他与工人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格列勃并非独来独往的孤胆英雄，他的一切行为离不开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他把自己的生命比作“人海当中的一粒微尘”，他对工人们说：“如果我是英雄，那么你们大家都是英雄。”他把自己的一切工作都看作是“党和我们的列宁号召我们做的”。作为一个“从战火和死亡中归来的人”，他受到了革命的锻炼，

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深刻地领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结束后，“一个伟大的斗争正开始，这个斗争将比一切的血战更艰苦，这不是儿戏：是经济战线！”他说：“什么是新经济政策？它就是用经济建设来打鬻鬼子的牙齿。”这些话听起来很平常，但又很真切，很形象，充分说明了一个经济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的正确理解。他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他“已经学会了分析自己的一举一动”。在抗击白匪武装的破坏的战斗中，他是机警果断的指挥员和英勇杀敌的战士；在恢复工厂的建设中，他是善于把党的号召变成群众行动的热情的鼓动者和以身作则、带头劳动的组织者。

此外，小说利用相当多的篇幅写了格列勃和工程师克列依斯特的相互关系。这些场面是耐人寻味的，它不仅对世界观截然不同的两种代表人物进行了强烈的对比，而且，提出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极其迫切的问题，即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克列依斯特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最初，他诬蔑革命是“一出巨大的悲剧”，怨恨工人“毁灭了他的命运，把全国象一团乱麻似的烧毁了”。他躲在“隐秘的屋子”里，充满没落死亡的恐怖，不时发出绝望的悲鸣。正在这时，一个被他陷害过的不速之客，打开他的窗子，站在他面前镇静得使他感到惊奇和恐怖。克列依斯特见到突如其来的格列勃，认为“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因为，这个人绝对不会饶恕他。然而，格列勃的态度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对于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大公无私的工人阶级的理智使他尽力抑制私人的情绪和克服狭隘的复仇心理，表现出宽大的胸襟和英雄的气魄。他坦率地告诉对方：“我需要活着的

您，不需要死的。”“您的智慧，您的力量，已经被掌握在坚强和可靠的手里了，在劳动和建设的过程中，您会比以前为资本家服务的时候快乐千万倍，因为您以前是一个雇佣，现在成为一个自由的创造者。”在以格列勃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启发、影响和教育之下，克列依斯特开始感觉到，“一个从来不曾有过的幸福的生活”，“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他脸上浮现出微笑，“眼睛里闪着骄傲和热情的火花”，他“要把所有的知识、全部的经验、整个的生命都献给祖国”。他从一个“地下流亡者”变成了效忠于红色政权的技术专家、厂长，变成了共产党员的真挚的朋友。然而，这里却没有任何阶级调和的味道，我们看到的是党的政策的威力，共产党员高度的党性原则，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消极因素可以转变为积极因素的鲜明的实例。克列依斯特脱胎换骨的转变是艰巨的，又是合情合理的。在革命胜利以后，象克列依斯特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苦难的历程”，越来越多地站到无产阶级方面，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曾经指出：“真心诚意帮助工人和农民的，而不是终日埋怨和唾尽疯狂毒涎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百分比，正在苏维埃共和国逐月增加”（列宁：给高尔基的信，《译文》1955年6月号）。所以，作者在写格列勃同克列依斯特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的转变过程时，是既符合作品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又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实际，既服从于主题思想的需要，又从多方面增加了作品的光彩和中心人物的感染力。

第三，《水泥》的可贵之处不但表现在作者把自己的创作实践同当时的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他善于从生活的各种不同的角度，以细腻多采的笔墨来描绘

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和思想性格的变化，使他们极有个性和极为感人。在这方面，《水泥》在二十年代初期的苏联文学中可以说是难得的一部成功的作品。它在题材的选择和人物刻画方面，给苏联革命的文艺开辟了一条广阔的路子。《水泥》写的是工业题材，但它却不象那类当时被俄共（布）中央尖锐批评过的“车间的文学”作品那样，把人物关闭在一个工厂范围内，使他们围绕着机器打转转。《水泥》的这一特点，主要来源于作者对生活里的人物作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取决于作者的正确立场、思想和感情。《水泥》不是“在暖房里培植”出来的作品，而是作者的“青春和从事党的工作的热情的痕迹”。（《苏联人民的文学》，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10页）革拉特珂夫早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谈到如何塑造工人形象时曾经说过：“我们作家必须了解他们。应该同他们住在一起，同他们亲近，了解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感情世界。在这里，从旁观察是不行的，对艺术家来说，工人应该成为自己的亲人。要全心全意热爱他们的劳动，无微不至地了解它，并且感到工厂世界的美及其特色”，（《苏联作家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41页）革拉特珂夫的文艺观点和创作原则集中地体现在《水泥》这部作品里。这里的工人们都是作者真正喜爱的亲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为作者所熟悉，他们的每一个念头都为作者所掌握；作者同他们的思想感情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一致的。

这里，除了格列勃的形象之外，达莎的形象同样是成功的。对于达莎，评论界和读者中间存在不同的理解。作者本人的构思是：“在达莎的形象里，我很想描绘出一个用自己的生命争取到站在工人阶级最前列的权力的妇女”（《革拉特珂夫：《我怎样

写作〈水泥〉》）。作者通过达莎这个人物深刻地揭示了一条正确的妇女解放的道路，全面地描绘了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的成长过程。达莎不仅在生死关头，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繁杂的日常工作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且在处理个人爱情、家庭生活问题上也显示了她那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她跟格列勃爱情生活中的曲折经历，也真实可信地展示了她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妻子到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道路。因此，达莎形象更加丰满动人。达莎同格列勃的矛盾，实际上，是新旧两种思想、两种观念之间的冲突。当格列勃还不了解他的达莎三年来“怎样遭受苦难，怎样学会斗争，怎样找到幸福的路”的时候，他只把她看成是一个女人，自己的妻子，他追求一个安乐的“窠”。格列勃正如达莎所说的那样，“虽然是一个战士，可惜并没有战胜头脑”。“男性的偏见”，旧的生活习气无时不在作怪。达莎要求他把她当一个同志看待，尊重她的人格。这些话激怒了格列勃：“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人格，是女人……我才不要听你这一套大道理哩！……”达莎再也不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人了，她“认识到一些宝贵的东西”，“发现了自己的人格，并且懂得怎样爱护它”，她这“值得夸耀的收获”“谁也不能毁坏”。这是小说开头格列勃初返家园的情景。到了第十章《新生的力量》一节，格列勃听了达莎讲述的遭遇之后，“她的崇高的精神震惊了他”，“被感情压倒了”，认识到达莎“找到了正确的路”，她有了自己的“斗争的道路”。可是在小说的末尾，达莎又一次离开了家，这一次，格列勃完全感觉到，“站在他面前的不单是他的妻子，她也是一个跟他力量相等的人，一个负担了这些年里的一切艰苦的人”。达莎离开格列勃时说：“是呀……一切都被破坏了，一切都被搅

乱了……必须怎样重新建立爱情……至于怎样安排——我还不知道哩。必须再想一想，让我们考虑一下，商量一个办法。有一点是重要的：夫妻必须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拴上链子。可是现在咱们还套着镣铐哩，格列勃，我爱你，但是你必须改造自己……这样才会重新获得幸福。”荒凉的工厂开工了，但是，冷落的家还没有重建起来。格列勃战胜了敌人，但还没有肃清头脑里的旧思想。可见同“过去遗留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是多么困难，旧的习惯势力是多么顽固，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又是多么艰巨。这也是我们从《水泥》的人物身上应该得到的启示。

第四，革拉特珂夫晚年总结其创作经验时说过：“一个作家，如果他是在人民当中并且了解自己的人民，他就会创造出非常真实的作品来。……他是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会毫无根据地赞美和歌颂。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上并没有撒满鲜花。这是一条艰难的路程，一路上尽是斗争和严酷的考验”（《苏联人民的文学》，第110—111页）。《水泥》正是一部反映斗争和考验的“非常真实的作品”。以格列勃为首的工人阶级优秀分子在一手拿枪，一手拿锤子，拼命工作的同时，又要同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官僚主义分子开展无情的斗争。在正面人物之中，有在反击土匪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采矿工米契卡，有对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希拉姆之流势不两立并无情揭露巴津等官僚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的工人茹克，有对敌人始终保持警惕，并不时在监视希拉姆、哈普科、苏克辛内依以及巴津之流的阴谋活动和腐败生活的以前的游击队员茨赫拉捷，有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契比斯等人。在敌人阵营里，那个“没有一

丝生气”、“象死尸一样”的希拉姆钻进党内并窃取人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采取种种卑鄙手段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挖社会主义墙脚。在工人群众的揭发、反对之下，他终于遭到了可耻的下场，被逮捕法办。巴津这个人物则是党内最隐蔽最狡猾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同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十足的官僚主义分子。政治上，他打击迫害工人积极分子，包庇纵容反革命分子；生活上，侮辱女性，道德极端败坏；工作上，惯于玩弄革命的词句，骗取信任，不择手段地向上爬。格列勃一眼看穿巴津的伪装的反动面目，直到小说的最后一节，他还认为这个人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是，无论是格列勃，还是州委书记席特基和肃反委员会主席契比斯，都认为巴津这个人“不容易对付”。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根子深：中央有人支持他。比如，中央部门“那位淡黄头发的知识分子，居然以党的名义教训”席特基，“叫他向巴津看齐”。此外，巴津“很会应战：他会巧妙地利用官僚作风和机构、行政管理的经验和本人天赋的嗅觉”。因此，对付这类人，“要捉住他，必须从另一方面下手”，即“等待着适当的时机，来一个又快又准的打击”。虽然作者没有对巴津做结论，小说结尾，他还留在党内，但是，他的反动面目、罪恶行为、肮脏灵魂已被揭露。作者精心的安排告诉读者，这种人迟早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同时，人民对巴津之流更要提高警惕，跟他们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这种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作者在《信号火》一章中写得再透彻不过了：“……这一切不过是斗争中必有的插曲。将来还会发生许多事故，因为敌人还要长期地、形形色色地伪装成党和工人阶级的朋友，在国内干罪恶的勾当。向他们进行的斗争，将是残酷的、漫长的。”

作者塑造美霍娃和谢尔盖的形象的意图也很明显：通过前者表明党在施行新经济政策中遇到党内不坚定分子的反抗，他们“陷入了惊惶失措的状态，并在自己周围散布着灰心失望的情绪”（《联共党史》第318页）；通过后者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艰巨性，虽然他们身处革命队伍，但是，“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14页）

总之，《水泥》通过对一系列人物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从各种不同的场合和角度，进行的细腻、明快的刻画，具体真实地反映了二十年代初期苏联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所处的状况。

从艺术上看，《水泥》也不愧为苏联文学的“永久的碑碣”，它为后来革命文艺的发展奠定了水泥般坚实的基础。小说的情节安排紧凑，条理分明，它的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无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结构的处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革拉特珂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而且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具有丰

富路线斗争经验的老战士。在他晚年的生活中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斯大林同志逝世不久，一九五四年召开了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以肖洛霍夫为首的一些反动文人借此机会，掀起一股妖风，大搞分裂，大耍阴谋手段，利用大会讲坛恶毒攻击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否定革命的苏联文学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并对法捷耶夫等作协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面对这种卑鄙的挑衅活动，一位老作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出于“党性的责任”，当场发表了一项声明，对肖洛霍夫“没有党性精神”的发言“表示反对”，揭露他在“机智地说了两三句正确的话之后，接着就完全不成体统地攻击个人，这种攻击简直象诽谤，象算个人的帐”。并且指出：“根据过去的经验，我认为这里有着宗派主义的味道”（《苏联人民的文学》，第318页）。这位发表声明的老作家便是《水泥》的作者革拉特珂夫。他那种为了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挺身而出，顶狂风战恶浪，愤怒声讨修正主义分子的战斗精神，是很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上接第17页）而不看到或不去研究哲学思想本身在相对独立的条件下的逻辑发展，不去研究哲学思想上两条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具体内容，不去深刻阐述对立统一的规律在哲学思想本身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则还是不能说已深刻地、全面地阐明了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应该承认，过去在哲学史工作中这方面的研究是做得很不够的。特别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更无人敢去碰一碰这种问题。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系统地、全面地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研究哲学史的工作也该可以重新开始了。本文只是个人对这一工作的初步尝试。以对立统一规律来阐明全部哲学思想发展史的工作应该是我们全体哲学史工作者的一个共同的任务。